

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演变论

1917-1949

刘郁琪 著



The Narrative Evolution of
Chinese Modern Novels (1917-194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演变论

1917-1949

刘郁琪 著



The Narrative Evolution of
Chinese Modern Novels (1917-194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演变论:1917-1949/刘郁琪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5203-0685-0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I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365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25
插 页 2
字 数 336 千字
定 价 8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刘郁琪是一位敏于思考的年轻学者，他常常试图深入探讨一些问题，在探讨的过程中又不断发现问题，并力求解答这些问题，这确实是治学的重要素质。

刘郁琪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演变感兴趣，并进行思考，有许多自己的看法。

20 世纪初，由于各种力量的推动，中国小说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小说叙事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其演变过程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水平。

小说叙事的变化不仅仅是组织故事方式的变化，其中包含了更多的目的和关系。

文学叙事的改变，实际上也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改变。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传统的社会系统受到现代思想生活的影响发生了改变，文学也按照这样的变化对社会生活重新组织，也就是重新叙述。

进入 20 世纪后，中国小说出现了诸多现代的元素，比如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人权、阶级、斗争、革命等思想。这些现代思想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大，许多思想主要就是通过小说叙事传达的。

小说向中国读者展现了现代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这些现代元素在中国传统小说中是看不到的。小说所展现的现代生活方式让读者感到惊讶，他们也试图将现代生活叙事转化为实际需求，并以此组织自己的生活。

用现代叙事对社会生活进行重新组织是相当有效的。这个时期，中国城市迅速兴起，市民社会日渐壮大，市民成为小说最重要的读者群。在这样的条件下，通俗的白话文成为小说叙事的重要载体。用白话文进行叙事，小说更容易进入市民社会，也有更多的人接受小说，以白话文

作为小说叙事的媒介也成为必然。白话文的流行，并不在于它刻意地反叛传统，而在于社会现实的直接需要。白话文在小说叙事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尽管有人感觉到这种变化是有问题的，但是社会的需要并不因为这些问题而受到阻碍，小说却因为通俗的叙事媒介而与社会更为贴近。

在广泛的社会需求下，小说的叙事结构发生了变化，小说用更为通俗、日常的讲故事的方式将社会生活组织起来。这些生活主要是市民社会日常化的生活，日常化的结构方式进入世俗的小说之中。

许多接受了现代思想、向往新生活的知识分子投入小说的写作之中，他们用现代方式进行表述，力图获得更多的读者，让读者感悟生活，接受新的生活。现代小说的思想内容用新的叙事方式进行组织，才能够有效地表现出来，小说也因此呈现出它的力量，其社会功能也更为强大。

中国小说叙事的现代演变与社会思想的变化是一致的，对其进行研究，从中分析提取其特征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还要注意由这些叙事方式所组织的文学以及文化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这是互动的关系，从这里可以看到小说叙事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力。

刘郁琪的这部专著选择了一些重要的范例进行分析，从中可以获得许多启示，也非常期望他在不断的探索中发现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演变所带来的理论意义。

苏桂宁

2016年5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现代小说启蒙叙事的开创与自反	
——鲁迅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启蒙意蕴	5
第一节 “围观体”故事及其“忧愤深广”	
——也论鲁迅小说中的“看/被看”	6
一 围观体场景的普遍存在及其基本类型	6
二 围观体故事中的生命体验及启蒙主体的生成机制	11
三 围观体故事中叙述者——启蒙主体的复杂性与 双声性	17
第二节 “还乡体”模式与现代性体验的呈现	
——也论鲁迅小说中的“离去—归来—离去”	21
一 “离去—归来—离去”的发现及其意涵	22
二 启蒙现代性体验的呈现	26
三 被旧营垒同化的可能与反抗绝望	30
第三节 “格式的特别”与文化再造的自觉	
——也论鲁迅小说叙述形式的启蒙意蕴	35
一 视角更新与个性解放	35
二 流程转换与现代结构	40
三 白话写作与风格熔铸	44
第二章 五四启蒙小说叙事的两种基本模式	
——人生派与浪漫派小说的叙事比较	49
第一节 故事题材上的城乡分殊与互文	51

一	乔寓体验与城乡故事的分殊及统一	51
二	人生派小说中的知识者题材及其城市想象	55
三	浪漫派小说中的故乡与劳动者形象	59
第二节	叙述风格上的主客分离与互渗	64
一	浪漫派的主观抒情	65
二	人生派的客观冷静	71
三	主客分殊背后的相同与互溶	80
第三节	思想主题上的内外分野与互补	85
一	外在人生病态的描写与国民劣根性批判	86
二	“内心的要求”及其压抑	91
三	“时代病”/社会悲剧：对当下现实社会的批判	96
第三章	一个被遮蔽的现代小说叙事传统	103
——五四古典派小说的存在及其叙事		103
第一节	为古典派正名：一个被遮蔽的叙事传统	104
一	“一脉双流”之小说史叙述格局的形成与局限	104
二	系统线索的重新清理	112
三	“古典派”的成立及其含义	118
第二节	古典叙事风格的文本呈现	122
一	故事：古典氛围的营造	122
二	叙述：古典风格的显现	128
三	主题：古典意蕴的流露	136
第三节	与五四启蒙小说叙事主流之关系	142
一	五四启蒙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142
二	对五四的疏离	146
三	京派小说叙事风格的开启	151
第四章	左翼小说革命叙事的兴起与别创	157
——从普罗小说到七月小说的叙事流变		157
第一节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叙事转变	158
——“革命罗曼蒂克”小说的叙事解读		158
一	“革命”故事的进入	159

二	浪漫叙述的改造	164
三	“集体”观念的重塑	169
第二节 “左联”小说叙事模式的正格与变体		
	——茅盾、张天翼、萧红小说综论	174
一	阶级化图景的全景性勾勒及其变体	175
二	革命现实主义风格的确立与变奏	181
三	人性欲望的阶级化及其社会批判主题的分化	185
第三节 主流模式的疏离与非主流叙事的别创		
	——“七月派”作家路翎小说的叙事分析	191
一	现实阶级生活的“复杂化”还原	192
二	革命现实主义的“体验化”变革	197
三	人性欲望与阶级性的“含混化”再置	207
第五章 革命背景下的非左翼小说叙事		
	——非左翼和左翼小说的叙事比较	215
第一节 京派：别一种乡村叙事的开创		
	——沈从文小说的乡村叙事及其与左翼小说之比较	215
一	田园牧歌与阶级冲突的故事分野	216
二	古典抒情与客观现实风格的差异	222
三	人性化与阶级化价值主题的差异	229
第二节 海派：非阶级化的都市书写		
	——20世纪30年代海派和左翼小说都市叙事比较	234
一	都市世俗生活与都市阶级斗争故事的分野	235
二	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叙述风格的分化及流变	241
三	唯欲望化与去欲望化的价值主题分野	247
第三节 独立作家：革命图景下的启蒙坚守与超越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主主义作家小说叙事论	253
一	启蒙主义故事结构模式的承继与革命化位移	254
二	启蒙性叙述话语方式的承继与革命化创新	260
三	价值主题的革命化以及对启蒙主义的承继与深化	266

第六章 现代革命小说叙事模式的新创造

——毛泽东《讲话》与解放区小说叙事	273
第一节 毛泽东文艺叙事思想述略	
——以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	274
一 毛泽东的文艺故事思想：阶级化和斗争化	274
二 毛泽东的文艺叙述思想：民族化与民间化	278
三 毛泽东的意义调度思想：阶级性与歌颂性	282
第二节 《讲话》对解放区小说叙事的形塑	
——以丁玲的“转变”和赵树理的“发现”为例	286
一 丁玲等亭子间作家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286
二 赵树理等本土作家小说叙事模式的发现	290
三 形塑的反抗与叙事裂缝的存在	293
第三节 解放区小说与左翼小说叙事之比较	296
一 二元对立故事结构模式的由潜及显、由隐及明	296
二 叙述话语由精英化转向民间化、大众化	300
三 意义调度的单一化、明朗化、乐观化	304
结 语	309
后 记	313

绪 论

本书所谓中国现代小说，主要指五四新文学革命后出现的用现代白话文所写的新小说。它上起五四新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下迄 1949 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有关中国现代小说和文学史的研究，长期以来主要存在两种范式。一是由 20 世纪 50 年代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所开创的主流范式，其根据政治意识形态所排定的“鲁郭茅巴老曹”的小说座次，影响甚为深远。另一范式为海外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所开创，其以“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为理念，以利维斯的《大传统》和新批评学派细读法为方法，以普世价值的表达为准绳，发现了钱锺书、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清理出一条与主流研究范式完全不同的写作现代小说史的道路。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繁体版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传入中国大陆，对王瑶版的小说史叙述格局产生了强烈冲击，并引发了“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此后，两种写作范式开始相互融合调适，产生了多种文学史和小说史著作，其中较为重要的成果主要有：《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严家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年版）、《中国现代小说史》（杨义著，三卷本，1987 年后陆续出版）、《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等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 年初版）。这三本试图综融思想内容和文本审美批评两种分析方法、资料丰富翔实的小说史和文学史著作，拓展、丰富了现代文学和小说史的内容，笼罩性地影响了此后大部分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写作。

伴随着“重写文学史”的热潮，还出现了一种以西方叙事学理论为主要参照的小说史写作新视角：从叙事的角度重新考察和梳理小说的发展。最为突出的成果有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博士论文 1987 年）和程文超的《中国当代小说叙事演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这两本著作分别对中国近代和当代小说

的叙事演变作了详尽的梳理,颇具启发性。笔者非常认同这种做法,认为除了思想内容视角和审美批评视角外,小说研究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从叙事的角度切入,因为,小说说到底就是一门叙事的艺术。鉴于陈著和程著分别聚焦于近代和当代小说,对现代小说部分未予充分关注。因此有必要写作一部以1917—1949年的中国现代小说为对象的相对完整系统的叙事演变史论,一方面弥补现代小说没有叙事史的缺陷,另一方面也把陈著和程著连接贯通起来,从而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现当代小说叙事演变史研究的系列。

罗兰·巴特说:“叙述的分析迫不得已要采用演绎的方法,叙述的分析不得不首先假设一个描述的模式,然后从这个模式出发逐步深入到诸种类,诸种类既是模式的一部分又与模式有差别。”^①事实上,不同的理论家,已从不同的角度假设了许多这类描述的模式:大卫·波德维尔将叙事分成“故事世界”“情节结构”“叙述”三个层次^②;米克·巴尔将叙事分成文本、故事、叙述三个层次;热奈特将叙事分成故事、叙述话语、叙述行为三个层次;申丹则认为分成故事、话语两个层次,更为恰当^③。笔者认为这些划分各有道理,但都不甚准确。我们不妨遵照中国传统所谓“言”“象”“意”的方式,将叙事文本分成叙事对象—故事、叙事方式—话语、叙事主题—意蕴三个基本层次。而这三个基本层次内部,则可以按照叙事学的已有成果和思路继续细分出更小的层面。具体说来,“故事”可以分成人物关系结构、情节序列组织、环境空间设置等层面;“叙述”则可分成叙述情境、叙述流程、叙述言语等内容;而意义调度则可从价值轴线设定、价值场域布控、价值意向呈现等方面入手。有了这些相对统一和固定的观察“点”和“面”,就既可以共时性地总结某个时期(例如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总体特征,又可以历时性地梳理这一具体时段中小说叙事演变的轨迹。

笔者清醒地知道,叙事不仅仅是经典叙事学所认为的那样是与外在社会历史语境毫无关联的形式结构,而是形式结构、伦理意涵、文化精

① [法]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见伍蠡甫、胡经之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74页。

② [美]大卫·波德维尔:《电影诗学》,张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页。

③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9页。

神的综合体,对小说叙事演变的分析,除了要看到形式结构的变化外,更应看到促成这种演变的各种内外因素,以及这种形式结构演变后面所隐含的伦理意涵和文化精神的变迁。具体到中国现代小说叙事而言,其内在的演变逻辑,至少包括“一本三源”四个方面:“一本”是指文本层面自身的特征和流变轨迹;“三源”分别指(1)文本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文化发展逻辑,(2)中国传统叙事的影响,(3)西方叙事的影响。分析中国现代小说叙事史,必须时刻注意把握这一“一本三源”的四个方面。为方便起见,笔者将其分解为三个相辅相成的问题:一、中国现代小说各思潮流派自身的叙事特点是什么?二、各思潮流派之间在叙事上有何逻辑联系?或者说从叙事角度看其相互间的演变逻辑是什么?三、这种特点和演变与当时社会情势以及中西两个叙事传统的影响又有何关系?

本书便以回答上述三个问题为宗旨,集中探讨1917—1949年间中国现代小说的各种叙事现象及其流变轨迹。具体说来,全书共分六章:

第一章主要分析鲁迅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启蒙意蕴。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之父,也是最重要的五四启蒙思想家。本章主要分析其小说在叙事上的三个显著特点,以及这些特点背后的启蒙主义意蕴:一是“围观体”故事结构的启蒙意蕴及其“忧愤深广”——也论鲁迅小说中的“看/被看”;二是“还乡”体模式的开创与现代性体验的呈现——也论鲁迅小说中的“离去—归来—离去”;三是“格式的特别”与文化再造的自觉——也论鲁迅小说叙述形式的启蒙意蕴。

第二章主要以通常认为的“人生派”小说和“浪漫派”小说为分析对象,将二者视作五四启蒙叙事的两种基本模式,并对其叙事异同加以详细辨析。具体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故事题材上的城乡分殊与互文,二是叙述风格上的主客分离与互渗,三是思想主题上的内外分野与互补。

第三章一个被遮蔽的现代小说叙事传统,主要以废名、许地山等人的五四小说为对象,首先从资料考辨的角度认定这些小说可以构成一个“古典派”的传统,其次从小说叙事的层面,确认其属于“古典”风格,第三则分析这一“古典”风格与五四启蒙叙事之间的文化关联,以确定其在现代小说叙事中的特殊地位。

第四章主要以20世纪20年代末兴起、一直绵延至1949年的现代

左翼小说为对象，分析了二十余年所出现过的三个阶段或曰三种类型的左翼小说各自的叙事特征，以及它们前后之间的演变轨迹。具体而言，首先以最早的革命文学形态“革命罗曼蒂克”小说为对象，分析革命小说叙事的兴起，重点阐释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在叙事上的具体体现；然后以茅盾、张天翼、萧红等人的小说为例，阐述作为左翼小说主流的“左联”小说的“正格”及其两种变体在叙事上的特征；最后分析七月派对左翼主流小说叙事的批评及其对新的非主流叙事模式的别创。

第五章主要以比较为视角，将三四十年代的非左翼小说与左翼小说对举分析，以厘清二者叙事的异同，并更好地厘清现代小说叙事的版图结构和演变脉络。首先是京派乡村叙事与左翼小说之比较，其次是海派和左翼小说都市叙事的比较，最后是对民主主义作家小说叙事与左翼革命叙事之关系的分析，着力阐释其如何在革命图景下对五四启蒙立场进行坚守与超越。

第六章主要以毛泽东《讲话》和解放区小说叙事为分析对象。解放区小说叙事的崛起，既是现代左翼小说的顺势演进，也是现代小说向当代小说叙事演变的桥梁。这一切与毛泽东的《讲话》不无关系。故首先阐释毛泽东《讲话》的叙事学思想，然后从文本角度分析《讲话》的叙事学思想对解放区小说叙事的具体影响。最后把解放区小说和左翼小说的叙事进行对比分析，着力阐述二者之间在表面的“连续”背后，实质上的“断裂”关系。

结语部分对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内在谱系逻辑及其现代性意义、历史价值进行了简单总结。

第一章 现代小说启蒙叙事的开创与自反

——鲁迅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启蒙意蕴

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的现代转型，自清末民初的“小说界革命”始。当时所谓新小说、谴责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翻译小说，都已具有不少新的现代质素。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叙事的兴起，还是五四新文学革命之后。1918年，鲁迅在钱玄同等人的劝说下，从抄古碑的孤寂生活中，走入新文学革命的阵营，写下《狂人日记》。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①，相继写出了《呐喊》《彷徨》中的25篇小说，直到20世纪30年代还有小说集《故事新编》的出版。这些小说，无论叙事观念，故事结构，抑或叙述话语，都表现出完全现代的特质。它们是中西两大小说叙事传统碰撞结合后诞生的“第一个健康的婴儿”，也是中国现代小说叙事传统的“长房长子”。有人盛赞：“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②

但鲁迅写小说，并非纯粹为了艺术：“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③他清楚地知道：“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去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④也因此，有论者中肯地指出，“他是具有以小说

①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页。

② 严家炎：《〈呐喊〉〈彷徨〉的历史地位》，《世纪的足音》，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③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

④ 同上书，第525页。

参与历史发展的自觉性的，他把自己撰写的小说当做整个进步潮流的一翼”^①。这种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念，内在决定了鲁迅小说叙事的审美特质。本章的目的便在考察鲁迅的这种启蒙主义观念，是如何化为具体的小说叙事实践的。换言之，鲁迅小说究竟包含什么样的启蒙主义思想，它又是通过什么样的叙事形式实现的？

第一节 “围观体” 故事及其“忧愤深广” ——也论鲁迅小说中的“看/被看”

鲁迅的启蒙主义观念，集中表现为国民性问题的探讨和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许寿裳回忆，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经常讨论这么“三个相关的大问题”：“一 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 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三 它的病根何在？”^② 鲁迅弃医从文，也是因为文艺更能改造国民的精神，“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③ 正是在这种启蒙主义的问题视域中，鲁迅对传统与现实两个维度的中国展开批判，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就小说解读而言，泛泛地讨论鲁迅启蒙思想的深刻，没有太强的说服力。更切合小说实际的问题在于，鲁迅有关国民性批判的启蒙主义思想，究竟是通过何种具体的小说形式传达出来的。笔者以为，以“看/被看”为核心的围观体叙事结构，正是鲁迅为其启蒙主义的思想主题而找到的一种独特而有效的小说表现方式。

一 围观体场景的普遍存在及其基本类型

一个作家的成名作或处女作，往往蕴含其创作生命的许多甚至是全部密码。《狂人日记》作为鲁迅的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就是这样一篇

①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杨义文存》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页。

②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9页。

③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页。

在鲁迅小说创作史上具有“总序言”意义的作品。^① 小说讲述了一个农村知识者发疯的故事，不仅预示了此后鲁迅小说中不断出现的农民和知识者两大题材，而且隐含着关注这两大题材时的基本视角和深层结构。从题材来说，描写知识分子的故事，古已有之。例如《儒林外史》，便是以古代的“士”为主要描写对象。但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不单有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更有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各类“新的智识者”，杨义将之概括为“三代五类”。^②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在漫长的历史中，除了《诗经》中的“坎坎伐檀兮”，唐诗中的“锄禾日当午”，白居易的“卖炭翁”等寥寥几篇之外，很少有真正描写农村、表现农民的小说。恰如鲁迅自己所说：“古之小说，主角是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③ 鲁迅的小说，算是第一个把眼光下移，将农村和农民真正纳入表现视野的。鲁迅之后，知识分子和农民成了中国现代小说两大基本的题材类型。在国民性批判这一启蒙立场的主导下，无论是表现农民还是知识分子，鲁迅都不是一般性地表现其物质生活的贫困，而是从精神角度开掘其病苦。^④ “狂人”的痛苦，便不在于物质条件的不能得到满足，而在于精神上的恐惧和不安。这种精神上的恐惧和不安，主要通过狂人与他周边人物的紧张关系得以呈现。小说中，狂人作为一个独异的个体，始终笼罩在周边人的“眼光”之下，感到一种随时可能“被吃”的焦虑。换言之，周边的所有人物，仿佛一个“圆圈”，将他围困于其中。这样，周边人物和狂人之间，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围困与被围困的关系，它以直观的“看与被看”的方式组织起来，但本质上则是一种吃/被吃的关系。

若把《狂人日记》这种以个体与群体的对立为根本，由看与被看的方式组织起来，在本质上为吃/被吃关系的模式称之为“围观体”，

① 茅盾：《论鲁迅的小说》，《茅盾全集》第2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1页。

②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杨义文存》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187页。

③ 鲁迅：《南腔北调集·〈总退却〉序》，《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8页。

④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1页。

那这种模式几乎作为一种原型而存在于鲁迅此后所有的小说之中——值得补充的是，这种围与被围，除了表现为看/被看之外，也可以表现为说/被说、忆/被忆，甚至其他多种形式。首先，它构成了鲁迅几乎每一篇小说的基本结构，只是显隐程度各不相同而已。最为明显的莫过于《示众》。正如有论者分析的，这篇小说只有一个场面：看犯人；所有人物都只有一个动作：“看”；人物之间也只有一种关系：一面“看别人”，一面“被别人看”，由此构成了“看/被看”的二元对立。^①不过，就整体而言，这是一篇主要聚焦围观者，而被围观者被最大限度淡化的小小说。也有些小说，主要描写被围观者，而围观者的面目则模糊不清。例如《幸福的家庭》，被围困者的体验被细致地叙述出来，而围观者则被最大限度地隐去。除了《示众》《幸福的家庭》这两种极端的情形，其他小说则像《狂人日记》一样，几乎都会同时出现围观者和被围观者的形象。整体性的基本结构之外，围观体模式也是鲁迅结构具体小说场景的基本方法。例如《阿Q正传》就与《狂人日记》一样，不仅在整体上表现为“围观体”的结构——未庄的所有人都构成了阿Q的对立面，将其围困其中；而且在叙事的实际进程中，也不断地出现主人公被大家的眼光所包围、被谈论和嘲笑的围观体场景。

不论是作为整体性的结构逻辑，还是细节性的描绘方法，在鲁迅小说的围观体模式中，被围观者总是少数，通常是个人，而围观者则是多数，往往是一群。但真正决定鲁迅小说思想内涵和审美意蕴的，并非围观者与被围观者人数多寡的对比，而是被围者的身份特性以及他与围观者之间永远对立或隔膜的关系设置。钱理群等人认为，鲁迅小说可按照“被看者”的不同分成两类。一类发生在被侮辱、被损害的弱小、卑下者与群众之间。如《祝福》，祥林嫂无疑是这个世界中最为不幸的人了，但祥林嫂的不幸并没有引起真正的理解与同情，仅得到众人的围观，并通过“看（听）”的行为，转化为可供消遣的故事。另一类发生在先驱、先觉者与群众之间。如《药》，夏瑜作为革命者，是为大家包括群众的前途而奋斗，这是先驱者的形象，但就是这样一位先驱者的被

^①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1页。